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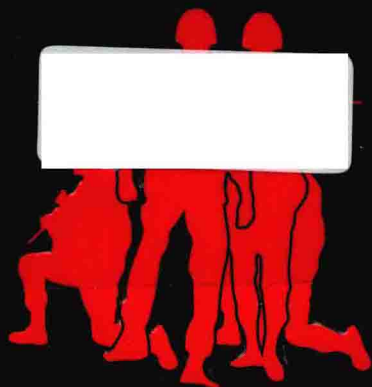
THE  
ROAD  
TO  
WAR

# 战争谎言

美国总统的承诺与背叛

[美] 马文·卡尔布 (MARVIN KALB) ◎著

刘辰 李清俊◎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THE  
ROAD  
TO  
WAR

战争谎言

美国总统的承诺与背叛

[美] 马文·卡尔布◎著

刘辰 李清俊◎译

人民日报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谎言:美国总统的承诺与背叛/(美)卡尔布著;刘辰、李清俊译. --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4.12

ISBN 978-7-5115-2938-1

I. ①战… II. ①卡… ②刘… ③李…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②政治-研究-美国 IV. ①D871.20②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98009号

THE ROAD TO WAR: PRESIDENTIAL COMMITMENTS

HONORED AND BETRAYED BY MARVIN KALB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4-8464

Copyright:© 2013 BY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People Daily Press

All right reserved.

本书由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授权给人民日报出版社,通过大苹果版权代理公司,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简体中文版,版权所有。

书 名:战争谎言—美国总统的承诺与背叛

著 者:(美)卡尔布 译 者:刘 辰 李清俊

---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陈 丹

封面设计:金 刚

---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65363527

编辑热线:(010) 65369528

网 址:www.peopledailynew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中新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220千字

印 张:16.5

印 次: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

书 号:ISBN 978-7-5115-2938-1

定 价:45.00元

## 序

多年来，尽管总统承诺的形式和大小不同，但讲的是履行和诚信，力量和决心，总统所言是有美国军事力量作为后盾的。在外交事务中，没有小事可言。

而一些承诺，如美国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承诺，一直履行得成功和持久，部分原因是这些承诺是以国会正式批准的庄重的条约为基础的。另一个实例是美国对韩国的承诺，也有一个共同防御条约为基础，到 1991 年 12 月，那里驻扎着装备有核武器的 2.85 万美军。

南越代表的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棘手实例。这是由总统承诺导致的战争，一届接着一届政府，美国就这样愚蠢地滑入了那场游击战争，正是这场战争夺去了 5.8 万美国人的生命。国会和媒体很少有人质疑这场战争的理由和合法性，直到为时已晚。

最后，本书以美国对韩国、南越和以色列的承诺为重点，或许以色列的情形最令人着迷。说到以色列，我们有一种不同寻常的亲密关系，在政治、文化和宗教上几乎保持一致，这种没有任何正式条约作为基础的关系却把两国的利益连接到了一起。这种关系主要建立在美国总统写给以色列总理的私人信件上，信中充满了美国对以色列安全的保证和承诺。多年来，许多承诺已得到履行，有一些却没有，这使得以色列领导人对美国承诺的最终可靠性的感到忧虑。

毫无疑问，总统承诺被视为庄重的，几乎是神圣的，是由总统代表其政府去付诸实现的诺言。而且其他国家可能会认为这些承诺是具有国家间约束力的，后继政府也要履行的诺言。但问题是他们会吗？

例如，1982年，罗纳德·里根总统保证美国“对以色列的捍卫是装甲承诺。”这种承诺当时对里根是有意义的，从那时起，一位总统接着一位总统地重复着那个承诺。但是，里根的保证现在还具有和当时一样的共鸣吗？那个承诺意味着如果以色列感到它必须轰炸伊朗以阻止其核计划，美国也必须参与打击吗？许多事情与领导和国家间的信任有关。以色列领导人对巴拉克·奥巴马的信任程度与对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一样吗？这些问题切中总统承诺的要害，即可行性。

自二战以来，总统更依赖公开和私下的承诺，而不是宣战，尽管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会有“宣战”的责任。有趣的是，在美国历史上，总统请求国会宣战只有5次：1812年战争、1846年美墨战争、1898年美西战争、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冷战开始至今，没有总统请求过国会宣战，尽管他们得到了国会对发动战争的不同程度的支持，通过正式的决议和拨款程序。现在，宣战似乎那么过时、在世界事务中如同早期时代的遗物，那时是显示绅士礼仪和风度的年代，各国在发动进攻前必须通知敌方，交战双方的军队站在山顶上等待黎明的初始阳光开始战斗。没有比莎士比亚对阿金库尔特战役的描述更为经典的了。

如今，战争遵循新的方式——在新科技和新战略的环境下进行，迫使总统面对不仅是可能的突然袭击，而且是现代科技的诸多挑战，如网络战争。冷战期间，总统解释其战争的动机是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的侵略；现在，9·11之后，他们指向伊拉克、阿富汗、索马里和也门的全球恐怖主义的危害。而且，真正担心的一直是日益扩大的核威胁，如果与伊朗谈判达不成协议，这种威胁可能在短时间内成为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自二战以来，虽然总统已命令美国部队参与了世界各地的战争——从朝鲜到越南、从巴拿马到格林纳达、从黎巴嫩到波斯尼亚。近年来，美国的焦点已经转向动荡的中东，从科威特到阿富汗、接着到伊拉克，然后又回到阿富汗，之后轻而易举地涉足利比亚和叙利亚——他们没有请求宣战，也一直没有有人直撞白宫提出这种要求。

只有一次，是在1973年，国会广泛地采取了行动以重申其在决定美国开战

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权力。当时，被永无止境的越战搞得十分沮丧的国会，在尼克松总统强烈反对的情况下还是通过了《战争权力法案》。该法案限定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为 60 或 90 天，除非国会特批才可延长。但这一立法几乎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会从来没有想要，也从未有过政治意愿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去挑战总统。2011 年，当奥巴马总统使用军事力量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时，他甚至没有通知国会。尽管国会有些人在嘀咕，却也不了了之。

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是冷战的极其令人厌恶的产物，为美国和苏联大多数的对抗提供了引人注目的背景。哈里·杜鲁门总统担心苏联独裁者约瑟夫·斯大林的帝国扩张是可以理解的。杜鲁门相信多米诺骨牌理论——一个国家倒向共产党会使同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几乎自动倒向共产党。

1950 年 6 月，北朝鲜在斯大林的祝福下向南朝鲜发动了进攻，杜鲁门觉得他别无选择，只有派遣美国军队阻止他们。他没有与国会磋商，后来证明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他声称他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这样，杜鲁门在外交和军事上吸引了更多的国际支持。他称这场战争是一次“警察行动”，认为会很快结束。它持续了 3 年，付出了 5.4 万多美国人生命的代价，最后导致一种尴尬的僵局（记者称之为“打成平局”），主要原因是杜鲁门担心其指挥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极力主张的战争升级可能导致与俄罗斯或与中国或与两国发生核战争。最终双方于 1953 年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使朝鲜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一分为二。

在这场战争的余烬中，杜鲁门和他的继任者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盘算半个面包或国家总比没有好，他们与韩国达成了共同防御条约，承诺如果再次遭到攻击，美国将急速捍卫南朝鲜。作为美国承诺最真诚的体现，美国在南朝鲜留下了成千上万名美军士兵，数量曾达到 6 万人，作为一种前哨试探性防线，抵御共产党可能发动的另一次进攻。数年后，核武器也装备到了这种前哨试探性防线上，至此，朝鲜和韩国分道扬镳。朝鲜一方，与俄罗斯和中国结成联盟，虽然具有讽刺意味地装备了核武器和远程导弹，但其经济是一个完全瘫痪的空架子。韩国一方有美国的保护，发展成为一个经济强国——是世界上第 8 位最有生产能力的贸易国家。

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促成朝韩两国和平共存的协议，但收效甚微。失望几乎总是随着努力而至。现在韩朝双方都是新一届的领导，这是温和复苏的希望之光——韩国总统朴槿惠，一位讲究实际的保守派，其外交政策的政治信条一直被正式地称为“信赖”，这说明她在一定的条件下准备与朝鲜打交道；朝鲜国家主席金正恩，一位年轻，比较有活力的忠诚的共产主义者，声称他想通过谈判统一朝鲜。他在 2011 年掌权后不久说“结束国家分裂、实现统一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消除南北之间的对抗。过去的朝韩关系的记录表明，同胞间的对抗只会导致战争<sup>①</sup>。”金正恩的言论间或给人以希望；他的行为则很少如此。他继续生产远程火箭、试验核弹头，近年来，又放弃了 1953 年的停战协定并用核攻击威胁美国。

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韩国的承诺仍然是强劲的。美国外交家几乎看不到变化的前景。他们令人信服地强调，如果韩国遭到攻击，美国将捍卫它。但是，一如既往，还存在问题。如果出于被迫的经济原因，美国不得不从韩国撤走军队，韩国这个盟友能幸存吗？能和以前一样强大吗？美国还要做什么以保护其在北亚的利益呢？美国能相信中国在韩朝和解谈判中发挥有帮助的作用吗？如果韩国选择走自己的路又会如何呢？

冷战另一个极其令人厌恶的产物是在南越那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争斗。从杜鲁门到尼克松，一位又一位总统所承诺的美国行动却导致了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和羞辱的失败。没有对美国的突然袭击如珍珠港口，也没有恐怖袭击如 9·11 来证明他们参战决定的合理性。总统们担心的是共产党的扩张——对他们来说，一种不可接受的前景，尤其在冷战期间。

美国陷入越南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当时法国正在试图对中南半岛再次施加其殖民统治。杜鲁门强烈反对欧洲在亚洲的殖民主义，但更强烈反对苏联极权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他心安理得地做出了实际的选择：为了在欧洲得到法国的帮助，他开始在中南半岛帮助法国——起初，提供有限的军事支持。不过，每批援助的同时，他和艾森豪威尔都使美国加深了对中南半岛的介入，最后直到 1955 年，法国在奠边府被击败后，退出越南，而美国人则被剩下收拾残局。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美国通过援引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反共言论，使其越南政策合理化，这也迎合了国会。60 年代，当美国把作战部队投入战争时，林登·约翰逊觉得他需要国会的直接支持。他没费多大力气就说服国会于 1964 年 8 月通过了《东京海湾》决议，这给了他无限的权力去平息中南半岛共产党的叛乱。

到那时，这场战争已经变成美国的战争。艾森豪威尔或许比其他任何一位总统更明白这一点，他做出一些关键决策，将南越不确定的未来与美国的利益拴在一起。1954 年，日内瓦公约后，他支持越南分成两部分：北方由共产党控制，南方由靠不住和不受欢迎的君主统治。1959 年，在一次被学者们忽视的演讲中，艾森豪威尔采取了下一个关键的一步：他正式地将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与继续存在的、独立的非共产党的南越联系在了一起。其结果是，当南越说他们需要帮助时，美国就提供——军事援助、金钱、教官，最终是成千上万的美国军队。有人批评或质疑艾森豪威尔的判断——南越对美国具有普遍认为的核心重要性吗？结果是，没有。国会或媒体有辩论吗？没有。将南越的未来与美国的国家利益联系起来的那个有问题的政策得到了一致的默许。

约翰·F.肯尼迪违背自己更好的直觉，他向南越派遣数以千计的军事顾问，还在 1963 年被暗杀的几周前，批准了一个反对独裁总统吴庭艳的丑陋政变。肯尼迪担心吴庭艳抵挡共产党的能力。

约翰逊不想成为第一个输掉一场战争的总统，他派遣成千上万的作战部队，解释说他的决定是总统对捍卫南越抵御共产党侵略的连续“承诺”中最新的一个。他解释说，他的决定是基于艾森豪威尔的承诺。到 1968 年 1 月，约翰逊已向南越派遣了 54.8 万军人。到 1975 年战争结束，5.8 万余人丧生。为了什么呢？没到 20 年的时间，美国和一个统一的越南相互献媚，以一种新的防御联盟来对抗中国。

甚至当尼克松改变策略开始从越南撤出美国军队时，也引用美国对南越的承诺来解释其政策，他说，1975 年 4 月下旬随着共产党的最后胜利，这一承诺最终到期。对尼克松来说，这个承诺代表美国的神圣诺言；对南越总统阮文绍来说，这个承诺代表可耻的背叛。

作为总统承诺的一个例子，对以色列的承诺与韩国和南越这两个例子不同。以色



列诞生于大屠杀的灰烬中，但它几乎奇迹般的繁荣起来成为动荡的中东地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以色列一次次地仅为自己的生存而战，而且在越来越多美国外交、经济和军事支持下，赢得了胜利。尽管两国关系一直非常密切，但从没有一个条约作为基础。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美国的在任总统用信件传达给以色列总理的话语。

话语是有结果的。总统说的话常常可以成为美国的政策，无论有没有国会的批准。当总统要把美国“投入”到一次行动中但有争议的时，他可以把国家置于战争之路也可以置于和解之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的权力已变得令人敬畏——他的话是决定性的。谁决定我们何时参战？总统。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告诉我，这“完全取决于”总统。“就是他的一声号令。”同样，什么时候、是否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支持一个友好国家都由他来决定。

总统，如巴拉克·奥巴马，保证美国对以色列具有“装甲承诺”——可以设想，这意味着如果以色列遭到攻击，美国将捍卫以色列。除了总统的口头诺言这种承诺还有其他什么内容吗？显然是有的。以色列享有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广泛支持。大多数情况下，两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但是总统是确定这种微妙关系的实质和顺畅展开的关键。

以色列政治领导人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奥巴马是否会履行诺言。他的承诺会得到他或他的继任履行还是背叛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意味着战争或和平。两国谈判达成一个正式防御条约——而且，这样以来，尽量减少甚至消除两国关系中存在怀疑的问题不是更好吗？质疑美国—以色列防御条约的价值或关联性的那些人指出，近年来奥巴马已经尽力组织巴—以和平谈判，结果一败涂地，因为巴勒斯坦反对以色列的定居点并反对以色列以安全名义坚持建立这样的定居点。他们问，一纸条约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事实上，即使谈判达成一项防御条约也很可能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新的动荡和焦虑，这就容易看到美国和以色列签约足以证明美国再也不能被指望充当一个公正的洽谈者。

奥巴马不止一次地警告说：“毫无疑问——美国绝不会让伊朗拥有核武器。”尽管世界已经听到这个警告，而且这句话该有多明确，但还有许多国家，特别是中东国家，质疑奥巴马是否真的会使用美国的军事力量阻止伊朗“获得核武

器”。据说在华盛顿和耶路撒冷，以色列和美国在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上从未有过更紧密的联盟。真的，但又不完全是真的。归根到底，出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以色列可能会自行攻击伊朗。那时以色列会期望美国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吗？奥巴马已经强烈地暗示会的。但是，没有一个共同防御条约，总统承诺的持久性和可靠性可能始终存在一个疑问。

正如我们在越南和在更广阔的中东所学到的，如果基于误算、误判或失信，总统的承诺就可能导致战争。它也可能导致和解。我们生活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即使是总统说的话现在在范围更大的批评性评论界也遭到质疑。在国内政策上，华盛顿通常类似于政治马戏团，脱离了理性和责任。但在外交政策上，当国际危机爆发，需要某种程度的全球领导能力时，美国总统的话语或承诺仍然代表金本位，即使这种黄金不像以前那样闪闪发光。



## 第一章 | Chapter I 杜鲁门的朝鲜战争..... 1

1/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男人 2

2/美国对韩国承诺的形成 5

3/朝鲜战争爆发 6

4/“老兵不死” 13

## 第二章 | Chapter II 美国“承诺”的出笼..... 19

一切是如何开始的 19

### 第三章 | Chapter III 艾森豪威尔..... 31

1/莫边府：帝国的毁灭 33

2/南越的诞生 38

3/“多米诺骨牌效应” 42

### 第四章 | Chapter IV 肯尼迪失败的政变..... 47

### 第五章 | Chapter V 约翰逊：“让我们继续” ..... 67

1/东京湾决议 71

2/约翰逊的重大决定：从顾问到战斗的角色 78

3/德朗河谷战役的教训 81

4/一年的试验和错觉 84

5/新年攻势的冲击 87

### 第六章 | Chapter VI 尼克松：“没有办法赢得这场战争” ..... 95

### 第七章 | Chapter VII 无论如何要摆脱..... 123

1/在巴黎的最后一推 132

2/“最后一搏” 135

3/莫斯科峰会，河内轰炸 142

第八章 | ChapterVIII “体面退出”或“体面间歇” ..... 159

第九章 | ChapterIX 以色列模式——史无前例与不可预知 ..... 181

1/一个总统承诺的具体例子 182

2/拉宾、贝京、福特的信 182

3/1967 年以后的背叛 197

4/一个美—以共同防御条约吗? 199

5/总统承诺的瞬态性质 202

第十章 | ChapterX 他们现在何处? ..... 207

1/韩国：条约承诺 208

2/越南：一个迅速成长、死亡，现在又重生的承诺 213

3/以色列：承诺通过通信就够了吗? 216

注释 ..... 224

后记 ..... 246

第一章 | chapter 1

## 杜鲁门的朝鲜战争

“铁幕已经降临在欧洲大陆上。”

——温斯顿·丘吉尔

这是一场很不寻常的战争，它始于欧洲但很快笼罩了整个世界。

二战后，正当美国遣散军队，从战时经济急剧转向和平经济之际，苏联却加强了对东欧的军事和意识形态控制，首先吞噬了阿尔巴尼亚、然后南斯拉夫，接着从 1945 年到 1947 年，又迅速波及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东德。1948 年 2 月，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权，把华盛顿剩下的那几个乐观主义者一下子抛到了一种战略沮丧的境地。莫斯科还积极推动共产党在中国、越南、法国和意大利接管政权。然而，越南的那场权力争夺在东南亚引发了一场大规模战争，使超过 5.8 万美国士兵命丧黄泉。

当时杰出的华盛顿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曾在一本书中给 1947 年出现的危机下了一个定义，正是这本书，命名了那一个时代。这本书的名字就是《冷战》。他写道，美国 and 苏联已经开始了艰难危险的竞争：使用代理人、谋求优势、增强军事力量，与实际战争仅差一步之遥。李普曼认为，这是一种冷战，而不是热战。老资格的莫斯科通和外交家乔治·凯南，也谈及了类似主题，并发表了一篇名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外交事务文章，并建议“遏制”苏联扩张，接着又强调了他指的不是使用军事力量。

实际上，李普曼和凯南是在回应温斯顿·丘吉尔的忧郁判断。丘吉尔预言：站立在世界面前的不是和平，而是另一场战争的情景。所以在二战结束后不久，丘吉尔就已经谈到了另一场战争。1946 年 3 月 5 日，在密苏里州富尔顿德的威斯敏斯特大学，英国的传奇战时首相扫视着欧洲地图，不情愿地得出结论：一

个“铁幕已经降临欧洲大陆，”一个扩大影响力和势力的“苏联范围”正在形成<sup>①</sup>。与英国领导人同台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也赞同这种对世界事务的悲观判断。他看到世界被一分为二：一半自由，另一半“倾向于他人的征服。”这便是冷战的开始。

杜鲁门在 1953 年 1 月离任时，回想起自己总统任期内的情形，他说，“在任期中，我几乎没有一天不被这种包括一切的争斗所主导。”

## 1/一位来自密苏里州的男人

哈里·杜鲁门，密苏里州人，是一位卑微、刻板的政治家，他恰逢天时地利。1944 年，杜鲁门是民主党参议员，因反对战时腐败而闻名，他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正面临缓慢死亡和前所未有的第 4 任期连任竞选。民主党的领导人确信罗斯福会获胜——世界还处在战争状态。但是，他们想从候选人的名单中拿掉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认为他太自由不适合当总统，因为他们预计罗斯福总统会在几个月内去世。

谁会代替华莱士呢？杜鲁门不是民主党的最爱，但他确实因廉洁和正直享誉政坛。加之几位更具竞争力的候选人在竞选中惨遭淘汰，杜鲁门便顺理成章地得到该党的首肯。1945 年 1 月 20 日，这位来自密苏里州的男人宣誓就任副总统，匆忙就任几个月后，于 1945 年 4 月 12 日，也就是罗斯福去世后，就任总统。他于是成为美国自 1896 年以来，唯一一位没有大学学位而就任总统一职的人。

杜鲁门宣誓就职时，他并不知道他很快将不得不做出许多会改变战后世界的总统承诺与决定。最快有结果且影响力巨大的便是他批准在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有效结束了二战。但因为这次核能源的使用，也同时开启了原子能和原子威胁的新时代。杜鲁门认为，他的决定将拯救成千上万美国士兵的生命，若非如此，果真打到日本本土肯定会导致无数人丧命。一两年的时间内，挑战摆满了他的办公桌。

早在 1947 年，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向阿塞拜疆移动（或假装移动），杜鲁门把此举解读为苏联想控制中东石油的供应。在丘吉尔的影响下，杜鲁门

决定采取行动。3月，他宣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价值4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等一系列计划。这是新诞生的“反共政策”，很快被称为“杜鲁门主义”。总统说这是“支持自由民族抵制武装的少数派别（共产党起义者）或外部压力（苏联的侵略计谋）的征服企图<sup>②</sup>。”6月，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在哈佛宣布了一项非凡的4年时间130亿美元重建西欧经济的援助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这位国务卿说：“我们的政策不针对任何一个国家”。甚至假装给苏联一个接受援助的机会，但是大家都清楚那是有条件的，而莫斯科将会觉得是不可接受的<sup>③</sup>。

在总统的宣布和承诺下，随着《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笼，美国开始了新的冷战政策，导致了美苏之间一系列重大对抗。决策模式早已确定：总统做重大决策，国会通过提供资金实际默许。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即使国会和总统之间偶尔出现分歧，总统的观点会获胜。杜鲁门的这些早期决定是战后总统言论权力演变的例子，利用白宫这块绝佳的讲坛，不仅制定政策还把国家领到有争议的目标上，甚至是战争——而且这样做无需国会认真的磋商，无需宣战，有时甚至无需国会的决议。不是每个人都赞成这种迅速崛起的行政权力，但是，在一触即发的焦虑时期，美国政府中没有一个人的权力堪比总统的权力。他是全国选举的唯一领导人。谈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特别是冷战时期，总统是至高无上的——至少在那个时期是这样。

世界在变化，但并不是向着好的方面。1948年6月24日苏联封锁了通往西柏林3个区域的铁路、水路和高速公路，这3个区域位于苏联控制的东德。西方有一种选择：它可以粉碎对柏林的封锁恢复通道，这可能引发一场新的战争；它可以接受共产党统治；或者它可以开始前所未有的空运行动，将重要物资空投到柏林的西区。杜鲁门决心不受人摆布，他告诉马歇尔：“我们坚守柏林。”随即，美国发起了“柏林空运”，一项真正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一直持续到1949年5月11日。在这11个月期间，杜鲁门下令飞行了278228架次飞机到柏林，在运载的货物中，有2326406吨的食品和物资以及冬季的150万吨煤炭。空运行动高度危险，要通过空中走廊，苏联人完全可以在任何时间予以封锁，但他们没有选择那样做。“柏林空运”是美国的力量、慷慨和杜鲁门



式领导的一次令人瞩目的展示，它拯救了柏林。

但是，东西方之间的关系明显在惊人地下滑，各方都试图战胜对方。1949年4月4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率先组建，包括美国在内共有12个创始国，他们担心苏联势力的明显蔓延，保证自己在军事上恪守这一原则：对一个成员的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成员国的攻击。（这于1919年在本质相同的问题上美国拒绝国际联盟有多么的不同！）接着，在1949年8月29日，苏联宣布他们已经试验成功了它的第一颗原子弹，绰号“乔—1”，几乎完全模仿美国投在广岛的“胖子”原子弹（这证明，苏联间谍可能已经窃取了美国的原子弹的秘密）。最后，在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打败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夺取了整个大陆的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共产党的威胁不仅遍及亚洲，还波及世界的其他国家。

在华盛顿，在参众两院，一个拥有核武器的扩张主义者苏联与一个拥有世界最多人口的革命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走到了一起，这一惊人的情景着实令美国政府集体感到不寒而栗。杜鲁门害怕新的战争，而“中国问题游说团体”（由国会共和党人和新闻媒体的保守成员组成）与总统一样也觉得恐惧，但同时感到这是政治的黄金机会。他们对杜鲁门开始了凶猛的攻击，理由是：“中国的失去”，好像是他给“失去”的；放弃蒋介石这样一个朋友和盟友；对共产党“温和”；国务院受到“赤色分子和左翼分子”的影响。中国问题游说团认为是杜鲁门在前进的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巨人面前崩溃了，因此他们的猛烈批评几乎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一夜之间，几个共和党国会议员，追求普通职业的普通政客，成了标题人物——缅因州的罗伯特·黑尔和明尼苏达州的沃尔特·贾德哀叹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地区的羞辱，爱荷华州的参议员布瑞克·B.希肯卢珀和威斯康辛州的约瑟夫·R.麦卡锡指责总统“领我们走的路是在塑造有利于共产党的政策”。他们寻找富有同情心的记者传播对“多米诺骨牌理论”的担心——如果中国能够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那么，日本、韩国、越南以及所有东南亚国家也会落入共产党人的手中。当1950年6月24日朝鲜入侵韩国时，中国问题游说团认为他们因失去中国，使美国陷入失去亚洲的深渊而把愤怒之火烧向杜鲁门是完全正确的。